

聖、王、賢、儒——漫談孔子廟的祭祀體制

／郭果六

孔子廟又稱文廟或孔廟。現行孔子廟的祭祀體制包含了以孔子為中心的大成殿與東西廡系統，以及以孔子五代祖先為祠主的崇聖祠系統。在中國各地普遍建廟奉祀孔子，是唐代創立的制度，因此孔子廟的祭祀體系肇始於唐，而後發展成如今的面貌，其間的演變過程足可探討。

孔子當年在曲阜北門外十餘里的洙、泗二水之間講學，死後即葬於該地。因弟子守墓，魯人前來憑弔，孔墓四週聚集了百餘戶人家，成為孔里。當年孔子與弟子居住的堂與舍，則闕為收藏孔子生前所用衣冠琴車書的廟堂，是中國最早的孔子廟，直到東漢中期的順帝年間，才遷往曲阜城內的孔子故居。漢高帝在位第十二年（前一九五五年）即在此廟以太牢祭孔，創下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。東漢明帝在永平十五年（七十二年）來此祭孔時，則首度以孔門七十二弟子從祀。洙、泗之間的孔子墓、孔里、孔廟大約在西漢成帝時被稱為闕里，因此闕里孔廟最早是指洙、泗間的孔子廟。

除了在洙、泗之間關地講學，孔子在曲阜城內另有故居，由其子孫後裔繼續居住。漢順

帝時（一二六一—一四四）又在此故居建廟祀孔，取代了城外的孔子廟，成為後人所稱的闕里孔廟，並且保存至今。學者們推論，曲阜城內的孔子廟應建於永建四年到陽嘉三年（一二九—一三四）之間。被尊為漢碑極品的乙瑛碑（一五三年立）、禮器碑（一五六六年立）、史晨碑（一六九年立）都是城內闕里孔廟草創階段的相關記錄。（註一）

對孔子的祭祀雖然早從孔子死後即已實行，漢明帝在永平二年（五十九年）更通令各郡縣的學校祭祀孔子，但是直到南北朝後期，闕里孔廟一直是中國惟一的孔子廟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（四八九）在京師立孔子廟，是在曲阜以外為孔子建廟之始，但是並未因此發展成全國性的建廟祭孔。闕里孔廟雖然足以成為眾多帝王前往祭拜孔子的廟堂，卻也具備家廟的性質，除了奉祀孔子之外，更有正父子，敘彝倫的意義。帝王親臨或派官來此祭孔，仍屬偶發性質，尚未建立制度。因此惟有全國性普遍為孔子立廟在唐朝成為定規之後，才建構出以龐大從祀體系為特色的祭孔制度，成為千餘年來教化全體中國人的重要體制。

唐朝創立的孔子廟祭祀體制

唐高祖武德二年（六一九），在國子學建周公孔子廟。武德七年以周公爲先聖，孔子配享。唐太宗貞觀二年（六二八），將周公移出周孔廟，以孔子爲先聖，顏淵配享。貞觀四年（六三〇），詔令全國各州縣學校都建孔子廟。貞觀二十一年（六四七）以左丘明至晉儒范寧的二十二位傳經、解經大儒配享孔廟，使孔廟的從祀達到二十三人。唐高宗永徽年間（六五〇—六五五）又以周公爲先聖，孔子爲先師，仍維持顏淵、左丘明至范寧等二十三人從祀，但在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又將周公遷出，重新以孔子爲先聖。唐睿宗太極元年（七一二）曾參入祀孔廟。唐玄宗開元八年（七二〇）重訂孔子廟的從祀規格，以顏淵配享，孔門的四科



大成至聖文宣王

孔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十哲在堂上從祀，曾參比照十哲也從祀於堂上，其他的及門弟子與二十二賢也列爲從祀。（註二）顏淵、十哲、曾參都塑成坐像供奉於正堂，七十子與二十二賢則以圖像繪於廟壁。開元二十七年（七三九）孔子被謚爲文宣王，顏淵爲充公，十哲稱侯，曾參及七十子稱伯。唐朝的孔子廟祭祀至此定型。

綜觀唐代孔子廟的演變，首先看到的是周公與孔子的合祀與分離。周公有制禮作樂的偉大政績，孔子又對他景仰有加，因此漢明帝時即以周孔同祀。唐朝開國之初特重典章制度的確立，所以在開國第二年即合祀周公與孔子，並置周公於孔子之上。但是周公的制禮作樂功比帝王，是政治成就，對儒家雖有奠基之功，卻非學術中人。因此顯慶二年將周公遷出，以孔子爲先聖成爲定制，孔子廟終於完成儒學道統的祭祀體制。而開元二十七年封孔子爲文宣王，使出身魯國大夫的孔子（其地位只是周天子的陪臣，亦即雙重的臣下），在封建體系中取得崇高地位，廟中塑像得以南面而坐。

貞觀二十一年首創以左丘明至范寧的二十二位經學大師從祀孔廟，開元八年又以孔子及門弟子入祀，使孔子廟的從祀成爲以顏淵配享，其下依次爲十哲、曾參、七十子、二十二賢的規範。開元二十七年更以公、侯、伯的爵號表現從祀者的等級差異，完善了孔廟的從祀制度。

在用語方面，《新唐書》以「二十二賢」稱呼從左丘明到傳授《穀梁春秋》的東晉范

寧。二十二人中名列第二的是傳授《詩經》的孔門高弟卜商（子夏），等到孔門弟子也獲從祀，卜商轉入十哲，傳經諸儒減為二十一人，但仍以二十二賢相稱。據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，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則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，唐代對孔門弟子的從祀即為《仲尼弟子列傳》的七十七



台北市孔子廟的東廡

人。又據孔子在《論語》對諸弟子的評述，可知顏淵最優異，因此早在三國時代，魏國的齊王芳在正始二年（二四一）以太牢祭孔時，就以顏淵配享，北齊還立孔顏廟，孔顏並祀在唐之前已成傳統。其次是《先進》篇的四科十哲：「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顏淵因為獲得配享而超越十哲，乃將傳授《孝經》的曾參納為十哲之末，其下是以顓孫師（子張）為首的六十六及門弟子。「七十子」本是以成數指稱三千孔子弟子中的優秀者，但是《新唐書》卻用它稱呼十哲之外，自曾參以下的六十七人。

將建廟祭孔發展成以孔門弟子與歷代傳經大儒為從祀的龐大體制，並以封建爵號賦與他們高尚地位，是唐代孔廟制度的重要特色，並且垂範後世，影響深遠。但是唐朝的祭孔並未延伸到孔子的父親或祖先，孔父叔梁紇在唐代未獲任何諡號，只在曲阜的闕里孔廟設有叔梁紇堂，對他做家廟式的奉祀。

宋朝的孔子廟制度

北宋從後周承襲了唐朝的孔廟制度，在正堂以塑像祭祀孔子、顏淵、十哲（含曾參），將七十二弟子與二十一儒者的畫像繪於東西廡的木壁，只是《宋史》在行文中把左丘明至范寧稱為二十一先儒，十哲以外的弟子叫做七十二賢，與唐朝的用語略異。

唐朝封孔子為文宣王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



台北市孔子廟的東西廡說明牌。人數有誤，先賢先儒合計是一五六人。

年（一〇〇八）再增諡為玄聖文宣王，後因大中祥符五年為宋太祖所上的尊號中有玄字，乃改稱至聖文宣王。（註三）玄聖出自《莊子·天道》篇的「玄聖素王」，意指有其道而無其爵的自貴者，至聖則是司馬遷在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的結尾對孔子的尊稱。（註四）

顏淵在宋朝仍為配享。宋神宗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增諡孟子為鄒國公，與顏淵同列配享。宋徽宗大觀二年（一一〇八）子思入祀，列在以左丘明為首的群儒之中。宋度宗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）子思被封為沂國公，曾參為鄒國公，二人一齊升為配享，使孔廟的配享達到四人，排名順序是兗國公顏淵、鄒國公會參、沂國公子思、鄒國公孟子，就此成為定制並沿襲至今，通稱四配。

因為顏淵配享，唐朝把曾參納入十哲以維持十人的局面。曾參在咸淳三年升祀配享，遂將七十子中的顛孫師（子張）列入十哲。依照唐制，七十子乃指十哲以外的六十七人，在宋朝扣除曾參與子張，尚有六十五人。然而宋朝另做考據，新增琴張、林放、孔鯉、申枹、蘧瑗、陳亢等六人，成為七十一人。被唐朝稱為二十二賢的二十一位傳經大儒，在宋朝仍然從祀，但又增祀荀況、揚雄、韓愈、子思、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、張栻、呂祖謙、邵雍、司馬光等十三人。

唐朝未給左丘明以下的歷代儒者爵號，宋朝則封這三十人（扣除升祀配享的子思）為伯爵，不過司馬光是溫國公，朱熹為徽國公，是以二人本有的爵號入祀孔廟。原本在唐朝封為伯爵的七十子，在宋朝升為侯爵。十哲在唐為侯，入宋則稱公。這是唐宋二代的封諡差異。

宋代從祀孔廟的眾人當中，王安石父子的情況頗為特殊。王安石在宋徽宗政和二年（一一三三）配享孔廟，位居顏孟之後，（註五）爵號為舒王，竟高於顏孟的公爵。其子王雱同時以臨川伯列入從祀諸儒。宋欽宗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王安石從配享降為一般的從祀儒者，並追奪王爵。宋孝宗淳熙四年（一一七七）王雱被取銷從祀，王安石則在宋理宗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遭到罷黜，結束了王氏父子曾在孔廟風光一時的一段插曲。

相較於唐朝，宋代首創以當朝儒者從祀孔

廟，不像唐朝的從祀儒者最晚只到東晉，對後世頗有影響。宋徽宗在崇寧四年（一一〇五）將新建的太學孔廟正殿命名為大成殿，（註六）致使大成殿成為全國孔廟正殿的正式名稱。大成出自《孟子·萬章》的「孔子之謂集大成。」



顏淵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曾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大中祥符元年（一一〇八）宋神宗乘封泰山之便，蒞臨闕里孔廟，向孔子行禮後臨幸叔梁紇堂，並命官致祭，而且追封叔梁紇齊國公，是孔子之父首次受祭與受封。仁宗慶曆八年（一一四八）在京師孔廟正殿後方立廟奉祀齊國公，冕服用九章，是為叔梁紇立廟之始。（註七）這是對孔子的推恩而非從祀，因此不屬孔廟體制而自成祭祀系統。明嘉靖十年才將叔梁紇的祭祀以啓聖祠的形式納入孔廟。

元朝的孔廟體制

元朝大致沿襲宋朝的孔廟制度。至大元年（一一三〇）加孔子封號為大成至聖文宣王。元文宗在至順元年（一一三三）封叔梁紇為啓聖王，將四配的爵號增為：顏淵—兗國復聖公、曾子—鄒國亞聖公、子思—沂國述聖公、孟子—鄒國亞聖公。四配自此享有「聖」的封號，日後以復聖、宗聖、述聖、亞聖為正式頭銜，肇始於此。元代新增的從祀儒者只有皇慶二年（一一三三）的許衡與至順元年的董仲舒。

依據裴侃在明正統三年（一四三八）所言，可知元朝在追封叔梁紇為啓聖王之後，為他在大成殿之西建殿奉祀。（註八）

明朝的孔廟體制

明朝建立之後，對孔子的廟祀一仍舊慣，奉持唐（文宣王）、宋（至聖）、元（大成）三朝所加的諡號，以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。明

沂國述聖公 孔子思



子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鄒國亞聖公

孟子



孟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世宗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才對孔廟的祭祀做出重大變革，形成現今所見的格局。

洪武朝曾發生罷黜孟子的事件。洪武五年（一三三二）明太祖讀到《孟子·離婁下》的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認為非臣子所宜言，於是下令撤銷孟子的配享。後

因刑部尚書錢唐冒死力諫，才在次年恢復。
（註九）

嘉靖九年明世宗廢除所有孔廟受祀者的封建爵號，孔子不再稱王，改稱至聖先師，但是保持面南的王者座向。四配不再稱公，改稱復聖、宗聖、述聖、亞聖。十哲及七十子稱先賢，左丘明以下的歷代儒者改稱先儒，使孔廟的祭祀變成聖、賢、儒三級。周敦頤在《通書》的〈志學〉章說：「聖希天，賢希聖，士希賢。」據此，士可以視為一般的儒者，賢是直接向聖學習的人，聖則下學而上達，自行效法天道。孔廟中既以孔子與四配為聖，而十哲及七十子曾直接受教於至聖，故稱先賢，（後來孟子的門人也稱先賢。）無緣希聖，只能私淑的後世儒者則稱先儒。如此以師道與學術為基準，跳脫了封建爵號的限制，孔子以至聖先師成為中華民族的最高導師，對他的崇祀不再受王爵的局限，可以採用「祭從生者」的原則，如遇天子親臨祭祀，即可採行天子規格的禮儀，反而更提升了孔子的地位。另一項變革是把孔廟中的塑像與繪像改為木主。無論塑像、畫像、木主都是中國自古即有的紀念先人方式，因此立像或立主意義相同。改為木主即可擺脫相似與否以及造像技藝高低的困擾，反而簡明莊重。

基於傳統的孝道規範，明世宗還將原有的啓聖王殿改為孔廟的啓聖祠，以免除父卑子尊的困擾。自從孔廟的從祀體制建成配享與一般從祀（分十哲、七十子、儒者）的等級區分之

後，即出現四配中的顏淵、曾參、子思高踞正堂，他們的父親顏路、曾點、孔鯉卻以七十子的身分廁身兩廡的尷尬。啓聖祠立於嘉靖十年，以孔子之父叔梁紇爲祠主，四配之父親配享，再以先儒中的傑出父親程珦（二程之父）、朱松（朱熹之父）、蔡元定（蔡沈之父）從祀，建祠於大成殿後方，另成祭祀體系，並且定位在比大成殿低一級的層次。因此祠主叔梁紇改稱啓聖公，使公成爲聖賢儒之外的另一孔廟祭祀頭銜，配享的四配之父稱先賢，從祀的先儒之父仍稱先儒。每逢春秋兩季的孔子祭典亦同日祭祀啓聖祠，在京城裡如遇輔臣主祭大成殿，則由祭酒祭啓聖祠；南京的文廟向由祭酒主祭，其啓聖祠遂由司業負責。（註十）供奉的籩豆牲帛，啓聖公比照四配，配享比照十哲，從祀比照東西廡。萬曆十二年（一五八四）新增周敦頤之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。

從祠兩廡的孔門弟子在明朝立國之初是七十人，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之際則有刪減。公伯寮、秦冉、顏何三人被黜，林放與蘧瑗改祀於家鄉孔廟，申黨因爲與申棖是同一人而除名，稍後顏路、曾點、孔鯉移祀啓聖祠，因此一共減少九人而成六十二先賢。明思宗在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）將原爲先儒的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朱熹、邵雍升爲先賢，又因左丘明生時曾與孔子直接論學，也升爲先賢。終明之世，孔廟先賢是東西廡六十九人，啓聖祠四人。

從元入明的從祀儒者爲三十五人，在嘉靖

九年也有刪減。在唐朝入祀的左丘明等二十一人，有戴勝等八人被黜，鄭眾等五人改祀於故鄉孔廟，後來左丘明又升祀先賢，只留下公羊高、穀梁赤、伏勝、高堂生、毛萇、孔安國、杜子春等七人爲先儒。其他十四位儒者有荀況與揚雄被黜，北宋五子與朱熹獲升先賢，而存六人。入明的三十五人最後只有十三人爲先儒。不過明朝一共新增胡安國等十五位先儒，共得先儒二十八人。另有四位先儒在啓聖祠。

清朝的孔廟體制

尙未入關之前清人在崇德元年（一六三六）建孔子廟於盛京，奉祀孔子及四配。世祖入關後即以京師國子監爲太學，並依明制建孔子廟。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以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，後來在順治十四年改回至聖先師孔子，至今未變。

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，朱熹由東廡先賢升入大成殿，位居十哲之後。五十四年以范仲淹從祀，是清朝增祀的第一位先儒。雍正即位後在元原有調整孔廟祭祀的重大改動，將孔子的五代祖先封以王爵：第五世祖木金父——肇聖王、高祖祈父——裕聖王、曾祖防叔——貽聖王、祖伯夏——昌聖王、父叔梁紇——啓聖王，一體入祀啓聖祠，排列次序爲第五世祖居中，其左爲高祖、其右爲曾祖，其次左爲祖，次右爲父，啓聖祠並更名爲崇聖祠以符合五位祠主的封號。如此，孔廟的祭祀在聖與賢之間確立王的層級，成爲如今所見的聖、王、賢、儒四

等。啓聖祠原有的配享與從祀不變。雍正二年增祀張載之父張迪爲先儒。咸豐七年（一八五七）將孔子的異母兄孔孟皮列爲配享之首，位居顏路之前，也稱先賢，乾隆年間副都御史陳德華曾奏請以孔孟皮從祀，但遭廷議批駁，直到此刻才由河南學政俞樾奏准。崇聖祠的祭祀對象此後不再有變化，並且延續至今。不過清代有人對從祀西廡的先賢孔忠未能入祀崇聖祠表示遺憾。孔忠是孔孟皮之子，孔子之姪，孔鯉的堂兄，子思的伯父，子思高居正殿，孔忠廁身西廡，有違血統輩分的尊卑，應將孔忠移祀崇聖祠爲宜。此外，公冶長是孔子女婿，南宮適是孔子姪女婿（娶孔孟皮之女），都是子思的長輩，因此亦有人主張移祀此二先賢至崇聖祠。

雍正二年還將先賢名單做了修正。明嘉靖九年罷祀的秦開與顏何得以復祀，降爲祀於鄉的林放與蘧瑗也得恢復，又增祀孔子弟子縣亶與牧皮，以及孟子弟子樂正子、公都子、萬



孔子廟的後殿是崇聖祠。
台北市孔子廟。

章、公孫丑。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先賢有若從兩廡升入大成殿，使原來的十哲加朱熹增爲十二哲。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又加入公明儀爲先賢，咸豐七年再增公孫僑。至此，兩廡的從祀先賢由清初的六十九人減去朱熹與有若，增加或恢復了十二人，達到七十九人，其後未再增減，並一直維持到現在。

不計崇聖祠的五位先賢，孔廟的從祀先賢都是至聖與亞聖的及門弟子，只有左丘明、北



崇聖祠的五位祠主是孔子的五代祖先。台北市孔子廟。

宋五子、朱熹例外，因此先賢從祀只需考證孔孟弟子的姓名與身分即可。相較而言，先儒從祀則取決於歷代儒者的學術成就與道德事功，由於年代久，人數多，各時代的學風又各具特色，以致先儒從祀的審定顯得繁瑣複雜，又常有仁智不同的取捨，至今議論不休。清朝入主中原後承繼了明代的二十八位先儒，終清之世又納入四十七人，再加上民國八年由北洋政府核准入祀的顏元與李塨，從祀先儒達七十七人，並維持到現在。清朝新增的先儒遠多於唐宋元明入祀的總合，清代如何審定這些從祀先儒，自然引人注意。

大體而言，清代的先儒從祀是由督撫學政及朝中高官上摺奏請，先經禮部批准，再經朝中大臣集議通過，才由皇帝頒布，交付全國孔廟一體入祀。但是最終的批准必由皇帝裁決。皇帝也曾主動提出意見交付廷議，得有結論再由皇帝決定。像這樣由廷議做結論供皇帝裁示，早在宋明即已實行，例如崇禎在十四年八月下令研議升左丘明、北宋五子、朱熹為先賢，結果廷議決定除了交議的七人之外，也應升祀董仲舒、王通、韓愈為先賢，但是後三人並未獲得崇禎批准。（註十一）類似的立祀過程清代有更多的執行細節可以參考，譬如康熙在五十二年倡議提高朱熹的祭祀等級，諭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詳議具奏，結論是將朱熹升入十哲之末，進入大成殿。雍正也在二年針對禮部的結論諭令重議是否從祀陸贄與韓琦，結果九卿翰林詹事科道會同國子監詳考之

後，並未同意。不過陸韓二人後來仍享從祀。

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御史牛鑑奏請以李容從祀獲得禮部批准，卻被朝廷否決，並在十二月十六日諭令：「先儒升祔學宮，祀典至鉅，必其人學術精純，經綸卓越，方可俎豆馨香，用昭崇報。若僅著述家言，闡明心性，未有躬行實踐，超越等倫，列祀鄉賢已足彰褒旌



台南市孔子廟的清代台灣府鄉賢祠與名宦祠

之義，豈宜升祔廟廷，稍滋冒濫。綜覈李容生平學行，雖足為閩黨衿式，然似此者亦不乏人，何能盡登兩廡？該部請如該御史所奏，准其從祀之處，著毋庸議。」（註十二）這是清廷首次明確指示先儒的從祀標準，值得注意。

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朝廷批示交由大學士軍機大臣議定明儒曹端應否從祀，同時命令一併酌定從祀章程，不得濫無限制。軍機大臣桂良等研議的結論是：「至從祀章程，例無明條。近來每以忠臣、義士、循吏、名臣率請附祀，雖其成仁取義愛君澤民原不外乎聖人之道，惟諸臣或已入祀昭忠祠，或入祀鄉賢、名宦祠，皆已廟食千秋，流芳俎豆。至如李綱、文天祥已配享歷代帝王廟，近年復從祀文廟，在國家褒獎名臣有加無已。惟從祀文廟應以闡明聖學，傳授道統為斷，應請嗣後除著書立

說，羽翼經傳，真能實踐躬行者，准各該省督撫臚列事實奏請從祀外，其餘忠義激烈者，即入祀昭忠祠，言行端方者入祀鄉賢祠，以道事君澤及民庶者，入祀名宦祠，概不得濫請從祀文廟。其名儒賢輔已經配享歷代帝王廟者，亦毋庸再請從祀文廟，以示區別。」（註十三）這是繼道光九年之後，更為具體的從祀標準，是今人理解先儒入祀孔廟的重要依據。

清朝在順治初年即通令各直省府州縣，在各自的孔廟設立名宦祠與鄉賢祠，每年春秋祭祀時，由地方官以少牢祭祀鄉賢與名宦。清朝有迴避制度，地方官必是外省人，鄉賢則是本地的傑出人士，名宦與鄉賢的入祀，必須奏請朝廷批准，已是莫大榮譽。台南市孔子廟仍保存昔年台灣府的名宦祠與名宦祠，共奉祀名宦十人，鄉賢二人，是此項制度的最佳例證。



台南孔廟鄉賢祠的陳震曜與王鳳來二鄉賢牌位



台南孔廟名宦祠的南向三名宦：施琅、姚啓聖、范承謨



台南孔廟名宦祠的西向名宦：陳瓚、施世驃等七人

先儒從祀固然應以「闡明聖學，傳授道統爲斷」，若非「著書立說，羽翼經傳，眞能實踐躬行者」，不得濫請。但是康熙五十四年以范仲淹從祀，卻開啓了道德學問之外，兼取經濟非常之才的例子。其理論基礎是孔門四科之中，政事本來就與德行、言語、文學並列。後

來雍正二年的諸葛亮，道光六年的陸贄，道光二十年的文天祥，咸豐元年的李綱，咸豐二年的韓琦，都屬經綸彌天壤，忠義貫日月的名臣，卻非對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的老師宿儒，准許他們入祀，表明朝廷教忠的教化意圖。清朝末年曾議論明末清初大儒王夫



彰化孔子廟的大成殿。全台最美。



台南市孔子廟的大成殿。全台最古。

之、黃宗羲、顧炎武的從祀，在此之前三人都曾被奏請從祀而遭批駁。此次部議的結論以顧炎武為醇儒，理應從祀，王黃二人則有學術上的偏激之處，不敢同意，交由朝廷裁示。結果朝廷裁定三人一同祀為先儒，其用心是當時國家多難，風雨飄搖，要藉著表彰這三人，以激勵民心效法他們忠於明朝，抵抗不屈的愛國情操。由此可見，孔廟從祀所包含的教化功能可以超越學術道統的範疇，以滿足施政的現實考量與需求，因此清初與朝廷對抗的儒者也得從祀了。（註十四）

自從漢儒陸賈以「居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？」把自誇「乃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！」的漢高祖駁得啞口無言，就已經註定了在天下承平之時，必然要以儒家學術為治國安邦的基本綱領。唐太宗在貞觀初某放榜日私幸端門，看到進士在榜下綴行而出，喜謂侍臣曰：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。」（註十五）唐太宗的肺腑之言，道盡了帝王站在治國平天下的高度，眼中見到的儒學為政治所用的冷酷現實。歷代帝王建廟祭孔不可能單純只為發揚儒學道統，必須從統治者施政教化的現實角度觀察，才能夠正確估量孔廟制度在古代政教中的功能與價值。

台灣現存古蹟級孔子廟的先儒從祀

咸豐七年進祀公孫僑之後，孔子廟的先賢從祀就未再增減，所以光緒朝的《大清會典事例》列有七十九位先賢的名單及東西廡排序，

是明確的官方規定，台灣地區的孔廟都可據以遵行。然而七十七位先儒的從祀卻因台灣割讓給日本，以致於光緒二十一年以後入祀的先儒未再正式納入台灣的孔子廟，因而出現先儒人數與排列順序的混亂，有待釐正。

日據時代從祀孔廟的先儒共有八人：

光緒二十一年：呂大臨（註十六）

光緒三十四年：王夫之、黃宗羲、顧炎武

（註十七）

宣統三年：劉因、趙岐（註十八）

民國八年：顏元、李塏（註十九）

就以台北、彰化、台南這三座具有古蹟地位的孔子廟而論，國定三級古蹟台北市孔子廟共陳列七十五位先儒，東廡三十七人，西廡三十八人，缺少了呂大臨、劉因、趙岐，卻多了從未獲准從祀的李塏。彰化孔子廟是一級古蹟，供奉東廡先儒三十三人。西廡三十七人，合計七十人，少了方孝孺、游酢、呂大臨、劉因、趙岐、顏元、李塏等七人。台南市的孔子廟有全台首學之譽，也是一級古蹟，供奉先儒七十八人，竟比正式的名單多了一人，所有日據時代入祀的八儒都在行列中，但被集中在東西兩廡末端附近，然而東廡之末是「先儒陸隴」的牌位，不知是何人。清儒「陸隴其」在雍正二年入祀，各地孔廟都有他的牌位，這位「陸隴」或許是陸隴其的衍文吧！

乾隆十八年清廷曾經明令孔廟的先儒排名要以各人出生時間為序：「先儒位次謹依史傳按年序次。」（註二十）而非按入祀時間先後

排列。咸豐十年又重申此令：「今合原定從祀與續經增祀之儒，入就時代，按其生年，一東

一西以次排列，庶無凌躐之虞。」（註二二）因此每次新增先儒都是按其生年插入名單中的



台北市孔子廟東廡先儒之末是從未獲准從祀的李顥



大成殿的至聖先師孔子神位。彰化孔子廟。



清儒陸隴其在台南市孔子廟東廡的牌位



台南市孔子廟東廡先儒之末是無考的陸隴

正確位置，早已建立正確的排名順序。如今對照台北、彰化、台南三地孔子廟的先儒排列，但見前後倒置，東西廡錯亂，凌亂不堪已到慘不忍睹的地步，讓人只好面對大成殿中高懸的光緒御匾「斯文在茲」苦笑矣。

圖片攝影：郭果六

註釋：

- 一、有關闕里孔廟的敘述，取自傅崇藍等著：《曲阜廟城與中國儒學》，上篇第三章，〈闕里孔廟〉節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北京。
- 二、十哲以外的孔門弟子（七十子）的從祀，《新唐書》卷十五〈禮樂五〉語焉不詳。但七十子既封伯爵又圖像於壁，必然也得從祀，只是不在正堂。宋承唐制，可為參照。
- 三、所上太祖尊號是：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。《宋史》卷一〇八。但上尊號時間《宋史》有大中祥符元年與五年二說，見楊家駱《宋史》卷三之校勘記第十條，鼎文版。五年說較合理。
- 四、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」
- 五、《宋史》，卷一〇五，志五十八。但另有一說謂王安石位居顏後孟前，見王明清：《揮塵錄》卷三。上海書店。上海。
- 六、孫承澤：《春明夢餘錄》，卷二十一。四庫全書版。
- 七、俞正燮：《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》，收入《癸巳存稿》卷九。世界書局。台北。
- 八、《明史》卷五十，志二十六，〈禮四〉。
- 九、黃瑜：《雙槐歲鈔》，卷一〈尊孔衛孟〉。中華書局。北京。
- 十、這種制度保存至今。九月二十八日以釋奠祭孔的前一小時，先以同樣的禮儀祭崇聖祠，祭孔由縣市長等地方首長主祭，崇聖祠則由民政局局長主祭。今人所談的祭孔大典並不包含祭孔之前的崇聖祠祭祀。
- 十一、孫承澤：《天府廣記》，卷九〈文廟〉章。大立出版社。台北。
- 十二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》，冊三十四，四七四頁。
- 十三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》，冊十，一三三—一三三頁。
- 十四、光緒元年批准在台為鄭成功建專祠，亦是同樣道理。
- 十五、王宗保：《摭言》，卷十五。中華書局。台北。
- 十六、十七、《清史稿》，卷二十四，本紀二十四，〈德宗一〉。呂大臨在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入祀，台灣在該年四月割讓。
- 十八、《清史稿》，卷二十五，本紀二十五，〈宣統皇帝〉。
- 十九、《中華民國史事紀要》，民國八年一月三日。
- 二十、二十一、光緒朝《大清會典事例》，卷四三六，〈禮部·中祀·先師廟制〉。但民國八年入祀的顏元與李焯，雖是清初學者，卻被置於西、東廡之末，並未遵行清代規矩。